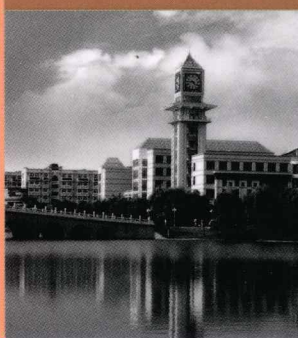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

——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研究

Making a full use of the Moral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赵炎才/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赵炎才/著

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

——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研究

Making a full use of the Moral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
研究/赵炎才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432-5

I. 致… II. 赵… III. 伦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近代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883 号

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研究

作 者: 赵炎才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校对: 邹皓丹 王 康

责任编辑: 苑 琛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6.75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432-5

定价: 38.00 元



CONTENTS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伦理道德概述 / 13

第一节 “伦理道德”释义 / 13

第二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概要 / 16

第三节 清末民初伦理道德时代环境 / 22

第四节 清末民初伦理道德基本内涵 / 27

第二章 道德致用（上） / 35

第一节 道德思维：救世、救亡与救国的源头活水 / 35

第二节 道德理想：救世、救亡与救国的终极诉求 / 45

第三节 道德精神：救世、救亡与救国的内在动力 / 57

第四节 道德判断：救世、救亡与救国的价值前提 / 65

第三章 道德致用（下） / 75

第一节 道德选择：救世、救亡与救国的实际抉择 / 75

第二节 道德责任：救世、救亡与救国的意识自觉 / 85

第三节 道德实践：救世、救亡与救国的具体外化 / 93

第四节 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的彼此互动 / 101

第四章 伦理重构（上） / 105

第一节 近代伦理重构一般 / 105



第二节	政治伦理：平等、忠于职守与公仆	/ 110
第三节	政党伦理：党内、党际与党政道德	/ 120
第四节	经济伦理：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道德	/ 130
第五章	伦理重构（下）	/ 141
第一节	父子、夫妇与男女家庭伦理	/ 141
第二节	私德、职业伦理与理想人格	/ 152
第三节	公德、社会伦理与公民道德	/ 162
第四节	近代民族、国家、国际伦理重构	/ 171
第六章	伦理道德与其它社会文化之关系	/ 188
第一节	伦理道德与固有文化、教育	/ 189
第二节	伦理道德与宗教、风俗、经济、科学	/ 200
第三节	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	/ 210
第四节	伦理道德与外国伦理道德	/ 219
第七章	近代伦理道德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反思	/ 227
第一节	中国近代伦理学	/ 227
第二节	伦理道德内外纵横比较	/ 236
第三节	近代嬗变的基本特征	/ 240
第四节	社会影响及其历史局限性	/ 243
余论		/ 247
参考文献		/ 250
个人相关论著		/ 260
后记		/ 263



绪 论

一、研究主旨

本书旨在从致用与重构互动角度契入对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作一专题性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清末民初的道德致用可谓中国传统“内圣外王”道德理想^①在近代的具体化,也是近代以来经世致用思想在道德上的必然反映;而伦理重构则体现了清末民初伦理逐步从传统儒学中疏离出来,并不断近代化的学术演化历程。二者既存在一定区别,又不乏内在关联,呈现出彼此互动态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蕴涵的社会价值(亦即外在功能)与学术价值(亦即内在学说)的有机统一,较好地体现了伦理道德的本质特征。民国初期,有论者曾言及道德体用问题,认为“道德有体有用。体不可变而用不能不变。”^②如此诠释虽不尽完美,尚未达到严格科学的理论程度,但多少揭示出此期伦理道德的基本实质,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发展趋势。

从理论上而言,作为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道德与伦理既各有其具体内涵,又密切相联,颇难截然分开。对此,清末民初时人已有所关注。在他们看来,所谓道德,从人与人之关系,是规定的人们行为的标准,^③或为日用常行成为习惯的法则,生活一定不易之道,如仁勇信智、正气、忠义、节烈、廉耻、信用、行为理想等等。比较而言,伦理侧重于体现为人与人之社会关系,如中国传统伦理主要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④从时人话语中不难看出,道德与伦理无论是在具体内涵还是在社会功用上均存在一定差异。对此,

① 关于此一思想,学术界诸多论著有所涉及,主要如崔永东:《内圣外王——中国人的人格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7页;葛荣晋:《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等。

② 高劳:《国民今后之道德》,《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五号,第4页。

③ 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第4页。

④ 伦父:《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五号,第2页。



梁启超、吴贯因等均作了一定理论界定。^① 虽然如此，它们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仍不乏相通之处。清末时期有论者即认为“有伦理即有道德。”^② 民国初期陈独秀指出：“吾人今日所谓道德伦理之诸名词者非他，吾先民所发明之制胜之公例，求真理之涂径而已。”^③ 而李璜则视伦理向外的积极操行与向内的消极操行等同于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④ 在这里，伦理与道德的内在共性初步显现出来了。

在清末民初社会实践中，由于民族、社会、国家等诸危机异常深重，时人在注重探寻其它救世^⑤途径之际，也比较关注道德之于社会、国家的重要作用。清末梁启超曾言及道德不过为求利益之一方便法门，批评有人不知学问之精神能救世，强调欲“发明出一完全之伦理学以为国民倡也。”^⑥ 这里，他直接将道德与求利，伦理与救世联系起来。同时代的革命派亦有同感，如有论者认为：“革命之业，非武力不足以为摧陷，非道德不足以维久远。”^⑦ 民国初期，类似之言更多。如吴贯因剖析现实社会混乱之状时指出：“今之所患者，乃在道德之堕落，而不在伦理之变迁。”^⑧ 为此，谷钟秀明确地祭起了“道德救亡”的大旗，^⑨ 高劳也高呼以“道德为救国之良剂。”^⑩ 这些言论洋溢着时人浓郁的道德致用之情。不仅如此，他们还身体力行，使此一实践哲学的内在本质在社会主体人身上充分彰显出来，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扣人心弦的历史活剧。

在具体道德致用过程中，伴随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自身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尝试重构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理论体系遂成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而中西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时人的积极价值诉求与伦理道德本身所蕴涵的趋同性则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势。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急速变化过程中，此一重构亦体现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具体理论体系涵盖总结过去、服务现实、展望未来等诸方面。如杨昌济曾指出：“伦理学，乃论吾人道德的理想者，乃将来之情态之研究当然也。伦理学虽亦研究过去与现实，

① 详见：第四章第一节清末民初伦理重构一般。

② 黄节：《黄史伦理书》，《国粹学报》第六期，（合订本），第679页。

③ 常乃惠：《纪陈独秀君演讲辞》，《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第3页。

④ 李璜：《伦理的社会性》，《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期，第1页。

⑤ 此与“救亡”、“救国”交替使用，而“救国”一语后渐成主流趋势。

⑥ 梁启超：《东籍月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⑦ 伯夔：《革命之心理》，《民报》（合订本），第3778页。

⑧ 吴贯因：《尊孔与读经》，《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合订本），第298页。

⑨ 谷钟秀：《道德救亡论》，《正谊》第一卷第一号，第1页。

⑩ 高劳：《国民今后之道德》，《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五号，第2页。



然此非斯学本来之目的。斯学本来之目的，即理想之研究也。”^①可以说，此期伦理重构实际体现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初步发展，而伦理道德与其它社会文化之关系亦凸现此一重构的历史复杂性。

本书在具体探讨清末民初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中，所涉及的对象并非囿于传统政治分野的主流群体，而力图尝试从历史大视野角度将此期主要的社会阶级、阶层、群体涵盖其中。所述内容主要围绕中国近代社会主题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实现近代化^②展开，以广泛的原始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基础上，透过新旧世纪更替与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异彩纷呈的丰富时代内涵，力图揭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嬗变规律，促进当代中国伦理文化日趋走向繁荣。

二、具体时域

在中国近代史^③上，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颇受时人青睐。正因为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贯穿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之中，并非某一特定阶段的文化景观。而本书之所以将“清末民初”视为探讨的时域（其具体时段大致为1895~1925年间）是因为此期中国传统社会的“新陈代谢”异常明显。同时，此期正处于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文化所经历的三个时期（由“器物”——“政制”——“伦理”或思想文化，类似表述亦称之为“言技”、“言政”、“言教”）中的第二至第三阶段。剖析此期伦理道德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有助于澄清史学界之于清末民初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恰如其分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如果审视一下中国近代社会，不难发现，清末民初30年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传统思想文化的裂变颇为深刻，学术界对此予以较多关注，相关论述甚多。比较而言，陈旭麓先生的观点尤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经甲午一击，引发了戊戌至五四间两次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此后的诸多学术论著基本沿袭此一观点，并以此作为学术主题展开的逻辑起点。^④胡伟希在其著述中如是指出，学术界“通常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视为中国近代史

① 杨昌济：《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四号，第1页。

② 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③ 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学术界存在一定分歧。但现在的总体倾向是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看待。主要观点见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本书亦采纳此一学术观点，将清末与民初纳入中国近代史范畴，而非近代史的结束与现代史的开始。

④ 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的开端，而近代中国人从思想文化层面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却是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这当中，1895 年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是一个契机。”^① 不仅如此，有论者还直接将 1895 年中日战争后的 30 年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转型期。如张灏教授认为：“这些思想变迁发生于 1895 到本世纪 1925 年间，那就是跨越了所谓中国历史转型期。”^② 对此观点，高力克教授引以为同调，视之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时代。他说：“张灏教授将 1895 年至 1924 年归为中国思想史上由古典而现代的‘转型时代’。此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激荡的 30 年，亦即近代中国的启蒙时代。”^③ 对此一启蒙的学理解读，研究者一般认为，如果“考察 20 世纪前 20 年的中国启蒙思潮，我们无法绕开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时段或说‘精神’事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撇开三者的‘政治’结局，也不论其对政治所能起到的正负作用，就作为这个时段涌现的文化启蒙思潮而言，它们算是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也许胡适先生的表述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预设：‘25 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④ 如此围绕清末民初 30 年社会变革与思想异动的论著比比皆是，其中引人瞩目之处是总体论证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趋新。而其中一般论及伦理道德者虽为数不少，但从广阔学术视野出发，直面伦理道德主题，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研究论著尚属鲜见。（详后）本书确定此一历史时期为研究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的时域，旨在通过对伦理道德之于民族、社会、国家的实际作用及其与时俱变的丰富时代内涵的探讨，深化对中国传统思想近代化复杂性与深刻性的理论认识与把握。

三、学术反思

事实上，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是一项既敏感又复杂的学术课题，因为它牵涉到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学与传统政治君主专制的近代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社会主体之于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的实际把握程度等诸方面。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绩斐然。^⑤ 从总体模式来看，个案研究、群体研究、专题研究并存且呈互动态势。至于关涉清末民初伦理道德

① 胡伟希：《观念的选择——20 世纪中国哲学与思想透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 页。

② 张灏：《再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2 年版，第 55 页。

③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自序》，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④ 张宝明：《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郑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第 83 页。

⑤ 因涉及面过于广泛，详尽论述在此从略。



近代嬗变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论著可谓指不胜数。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此一研究日趋深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此一学术研究有待改进之处亦难以回避。概言之，主要有以下数端：

1. 概念歧义甚多，诠释比较模棱，评价尚非公允。

从理论上而言，伦理、道德与伦理道德三个概念各有其学术内涵，同时，也不乏内在关联。如果审视一下此期有关伦理道德的论著，不难发现，一般研究者基本上将它们视为通用概念，并未作进一步具体学理解读。如此等量齐观虽有利于论著行文展开，但在客观上易引起人们概念上的歧见或误读。而自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初期思想领域革命与复古、中外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诱发全盘否定传统伦理道德之论甚嚣尘上，以至思想革命论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而学术界之于伦理道德概念的模糊处理，更加深了人们对伦理道德本身的疑惑，影响了对它们历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即使是同一概念“道德”，表述者无不从自己所处阶级立场出发作出诠释，以致落后反动的，语义中性的，体现民族积极精神的乃至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思想，均以“道德”面目出现，让人真伪难辨，无所适从。更何况某些概念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内涵侧重点各异，而以个人的喜怒哀乐为中心，在方法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者比比皆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实，清末民初时人既有漠视其内在细微区别，在特定语境下混合使用的现象，亦不乏对此存在不同诠释，力图进行理论重构的学理尝试，体现了他们应有的崇高学术追求。因此，进一步挖掘相关史料，梳理时人的具体表述，明确其实际内涵成为该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前提，也是正确评价伦理道德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地位的客观需要。

2. 分述清末与民初成果多，而视清末民初为整体综合研究少。

在迄今为止的诸多论著中，有关以伦理、道德或伦理道德为题直面清末民初社会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研究的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导致此一现象的原因甚多，其中比较突出的可能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传统有关，因为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分期主要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将中国近代史分成两概：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与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如此分期在当时虽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客观上影响了对清末民初社会诸方面研究的深化。如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王泽应近著《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虽以20世纪为时域，但内涵则更倾向于民国初期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三派的伦理思潮。近年来要求打通中国近代史的呼声渐高，逐步成为史学界共识，并已有部分史学论著问世。^①在思想文化方面，吴雁南教授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

^① 王文泉等：《中国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潮》(1840~1949年)即是其中里程碑式的具体成果。就伦理思想研究而言,目前虽已有诸多专著问世,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近代以来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作了有益探讨,但将清末民初(1895~1925)视为整体,从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角度契入,全面系统剖析中国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的论著则尚属鲜见。因此,对此展开研究反映了中国近代伦理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3. 针对少数精英人物研究多,学术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

迄今为止,有关研究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专著倾向于理论诠释,其内涵多为时代精英人物的伦理道德思想。围绕这些精英,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国内主流学者对思想激进者伦理道德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在具体表述上,大多以基本规范与原理近代化为轴心展开,具体论证多局限于从概念到概念上的抽象演绎,使人感到伦理道德过于虚悬,似乎与实际生活关系不太密切。如此思辨色彩甚浓,思想性大于应用性的纯哲学或伦理学的研究虽不乏其具体合理性,并能随社会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但具体社会效果却值得认真反思。比较而言,部分海外学者如芮玛丽、费维凯、列文森等人的研究也多囿于此一模式,并将精英人物扩及部分文化保守人士,并由此得出儒家思想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学术结论。很显然,这些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过于单一,人物覆盖面比较狭窄,难以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想变化更广阔的层面。因此,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扩大人物研究范围,从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相结合展开,有助于拓展研究视域,深化相关研究主题。

4. 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更替成为研究主流,探讨伦理道德自身嬗变比较薄弱。

有论者在剖析中国近代思想流变时指出:“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思想,激活了儒家古老的‘大同’乌托邦,使其有古典的道德理想王国转化为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现代式革命乌托邦和政治宗教。”^①用如此观点来衡量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亦甚为恰当。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存有一定偏差。如对“道德决定论”批判有余而研究不足,极大限制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的深层次研究,以致蕴涵其中的合理内核未能被充分揭示出来,使伦理重构难臻完美。当然,冲破既有格局,尝试新探索者颇不乏人。迄今为止,学术界将道德与伦理视为两个不同概念区别对待,并综合起来展开研究的莫过于任剑涛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

^①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288页。



主义》。^①对清末民初道德致用思潮的研究虽未出现理论性专著，但亦有一定程度的学理探讨。具体内涵主要围绕个案研究，或群体研究，并已取得一定成果。如沈善洪、王凤贤认为梁启超是“道德救国”论的典型代表。^②但在具体理论深度上，陈少明的论述较为深入。他指出：在“与佛学的兴起相联系的，是一股势头颇大的道德救世思潮。它不仅是佛学，也包括儒学。总之，有鲜明的传统思想色彩。”“五四运动以后，道德救世主义便与文化复古主义倾向合流了，之所以说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理由是：两者同强调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同把道德教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③李怡在所著中称无政府主义者是“道德万能”、“道德改造世界”的信奉者。^④相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嬗变，如此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有必要加以深化。至于伦理重构，部分论著虽有所涉及，^⑤但仍比较薄弱。其实，从学术角度而言，清末民初，中国伦理道德开始从传统儒学中疏离出来，逐渐形成中国近代伦理学。相对于其它学术研究，对此探讨有待深化。

5. 专门性史料运用多，综合性史料利用少。

迄今为止的相关伦理道德论著所用史料多出自学界早期出版的个人文集或资料汇编。囿于时代性及思想性，这些资料的取舍存在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内容比较单一，零散有余而系统不足，难以真正将伦理道德置于当时时代话语中作比较系统的理论解读，把握其内在本质。伴随中国当代学术的不断进步，历史资料的收集与出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诸多鲜为人知的个人史料（如个人日记、个人回忆录、年谱、全集）及相关文献（档案资料、报刊杂志等等）陆续刊布或影印再版，其中蕴涵伦理道德思想的史料尤为丰富。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港台地区及国外的相关史料亦易于获得。面对如此之多的史料，有必要在具体研究中加以认真利用，以促进相关研究走向深化。

6. 倾向于革命政治范式，内涵易流于空疏化。

在已有学术专著中，从总体来看，中国当代传统史学在指导思想上比较注重革命意识论，史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倾向于“革命”的政治范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所具有的工具理性逐渐被人视为价值理性，“革命权威”先于或取代了“理性权威”，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得服从革命的需要。

① 任剑涛：《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沈善洪、王凤贤：《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

③ 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④ 李怡：《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⑤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要,于是,革命成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革命本来只是实现理性目标的手段,而当它成了神圣权威之后,理性反过来成了革命的工具。理性准备与理性基础不足,使革命经常为狭隘的功利与实用主义的思维所支配”,导致革命权威与理性权威错位。^①事实上,革命意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意识论纽结在一起,颇难截然分开。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异常深重等复杂原因,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认为它应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灾难承担责任,并由此引发的其中一个后果是视传统伦理道德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阻碍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而简单加以抛弃。如此从政治、近代化出发看待传统伦理文化虽不乏其积极意义,但也影响了人们对传统伦理文化的学理清算与理性分析,容易导致以偏概全,漠视传统伦理道德的合理内核,最终导向道德虚无主义倾向。

7. 如何回应当代社会挑战伦理思想研究有待加强。

伴随人类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速,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及其互动成为当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②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人文危机,对道德功能的探讨已提到议事日程。自工业革命引发近代化潮流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冲突早已引起人们的关切,有关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后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道德的转型、新伦理规范的建构应当如何与社会的转型相适应,形成良性的关系,已经是一个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③迄今为止,诸多关心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学者对日益失衡的道德现象深表关注,还有诸多学者围绕如何解决、完善当代道德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和理论重构,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④这说明“‘道德理想’在今日已经成为文化界、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⑤这些成果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角度对当代道德所面临的困境作了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具有其积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当代道德问题并非简单的现实问题,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传统意识形态近代化过程的延续和发展。解决当代道德

①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0~71页。

② 姚新中:《道德活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③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4页。

④ 主要论著有唐凯麟:《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道德重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203页。



问题既需要横向探讨应该以及如何完善的问题，也离不开纵向的历史总结。时代发展对研究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回应伦理道德“无用”论，现存论著虽有所涉及，但直接回应乏力。清末民初时人在此方面已有诸多争论。深入剖析其内涵，不难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总之，清末民初伦理道德研究存在有待改进之处涉及诸多方面，而上述几方面仅就其大端作一剖析。有鉴于此，从世纪意识出发，全面深入探讨清末民初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既可以探讨道德致用的社会性，亦能关注伦理重构的学术性，更好地把握伦理道德近代化的内在实质。因而，研究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不仅具有积极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四、探讨内涵

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与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学、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主体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纠结在一起。针对前述研究有待改进之处，其学术探讨仍具较大拓展空间。从总体来看，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探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经历了一个由用而体的学术发展过程

作为一门学问，伦理道德具有其应有的社会性与学术性。前者着眼于它之于社会的实际作用而言，而后者则强调其自身具有内在发展规律。在中国近代，其作用主要体现为社会志士仁人积极利用道德的合理思想资源与精神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同时，伴随此一进程的推进，传统伦理道德自身亦发生近代转化，且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展现出其内在规律。一般而论，人们往往将近代伦理道德重构视为一个完美理论形态。其实，从一开始，它表现出浓厚的社会性，在因应时代危机中而逐渐显现出来，用现代术语表述，可视为道德社会学，或伦理应用学，而非纯粹的伦理学或道德学。可以说，从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它经历了由道德社会学到道德学，或伦理应用学到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当代伦理道德发展趋势由纯理论向应用转化不尽相同。

2. 深入诠释清末民初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的时代内涵

从总体来看，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的思想产物，而道德致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在伦理学上的必然反映。面对严峻时局，挽救民族、社会、国家危机成为时人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在找寻精神武器过程中，时人自然而然地将眼光投向堪称中国思想资源宝库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具体利用过程中，弘扬传统伦理道德之精华，吸收西方近代积极道德思想因子成为时代所必需。如时人追求的救世实际蕴涵现实救世与未来救世



双重追求，而后者则将对人的终极关怀与社会关怀融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在救世过程中，伦理道德重构亦随之展开。而如何甄别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与糟粕乃时人面临的重要难题。事实上，他们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具体需要与可能来评判传统伦理道德价值。对那些具有现实作用的伦理道德予以积极肯定、努力加以运用，并通过现实实效反过来实施具体的理论重构。可以说，许多伦理道德内涵的嬗变并非充分理论诠释后的实际展开，而是在经历了社会实践检验后再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重构。此一重构既不是简单地用新式伦理道德取代旧式伦理道德的过程，亦非完全用西方近代伦理道德更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过程，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在对传统伦理道德作一定理性判断与取舍基础上，积极融合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合理思想因子，作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理论诠释与综合创新而逐步展开的。而此一演进并无固定模式，而是遵循社会变迁实际，经过量变进而发展到质变的过程。此一实际过程的具体进展程度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国内社会危机的加剧和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联系在一起，既有对中国当时的现实关怀，亦有根据西方社会的问题而对中国及世界将来社会问题的未来设计。同时，它也与社会主体自身诸多因素有关。因此，中国近代伦理道德重构的过程比较复杂，也不够完整。当然，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步解决，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近代学科的不断创立，在近代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基础上，中国近代伦理学亦得到初步确立。

3. 系统剖析清末民初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的互动关系

时人依据当时社会的历史现实与需要，在积极致力于道德致用时，亦展开了伦理道德思想的变革与重构，力图为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必要的精神保障，因为蕴涵在伦理道德思想中的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①当然，道德致用内涵颇为复杂，不同阶级、群体、学派等均不乏其主张，但总体内涵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视道德为救世、救亡与救国工具，强调道德的实效性；二是道德在作用于社会时，也会受到社会需要的刺激，产生新的时代嬗变，以适应现实社会变化的需要。在中国近代道德致用思潮中，道德致用与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改造、近代伦理学的创立密切联系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这具体展示为由价值导引到价值观念变迁再到价值重构的历史过程，蕴涵着传统道德近代化和近代伦理学萌发。

^① 陈晏清：《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1日。



4. 解析道德致用中的内在冲突, 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历史地位

清末民初道德致用与伦理道德重构及其互动本身蕴涵着分歧乃至斗争。从总体来看, 它既包括传统伦理道德内部的纷争, 也涉及中西伦理道德的冲突, 更有对西方近代伦理道德不同理解的对垒。即使在同一主题下, 由于具体方法上的差异, 道德致用的派别不同, 冲突或激烈, 或平和。归根结底, 这一冲突的本质在于究竟塑造什么样的人, 如何实施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由于道德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实际上就是传统人的近代全面发展。在价值观念上, 就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① 清末民初, 道德致用因为派别不同, 道德选择及其实践迥然有别, 所产生的作用并非完全一致。如果因为批判顽固派的道德致用, 进而否定维新派、革命派的道德致用, 不免以偏概全, 难以如实揭示历史的真相, 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伦理重构亦属如此。因此, 解析道德致用中的内在冲突, 有助于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在具体历史发展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

5. 厘清时人关于伦理道德新旧等概念的具体诠释及其近代衍化过程

学术界对这些关系的探讨, 虽已从原有截然对立的二分法中摆脱出来, 但如何认识它们的共性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萧功秦先生在其论著中比较喜欢运用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杜尔凯姆在《自杀论》中使用的“失范”这一概念, 认为它是解释新旧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力削弱后产生的社会后果问题。^② 他指出: “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于传统, 为现代化的政治新生又必须抛弃传统, 这或许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其结果是, 中国人在自觉的意识层面对传统的抨击日益激烈; 另一方面, 在深层的或不自觉的意识层面上, 这种传统对人心的镇制力,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权势者的诱惑力又从来没有削弱过。旧的政治的复活, 又进而激起意识层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失范有更深了一层, 如此循环往复。”^③ 其实, 它们的共性更多地体现在道德致用时代主题上。在伦理重构的理论诠释中, 时人也作了必要的学理界定。如果对道德致用与伦理重构作系统深入的理论剖析, 有助于化解此一学术难题。

6. 梳理影响清末民初传统伦理道德与其它社会文化的关系

此期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嬗变与固有文化、教育、宗教、风俗、经济、科学、政治、法律、外国伦理道德等存在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 它既融汇了这些

① 陈晏清:《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1日。

② 萧功秦:《萧功秦集·自序》,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③ 萧功秦:《萧功秦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文化的积极思想成分，又与它们产生互动，对促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以及这些文化自身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与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今中外进行适当地比较，有助于深化对其内在本质的认识。如此可大致理清中西近代伦理道德不同的具体发展路径以及探索中国特有的近代伦理道德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总而言之，前述几个方面既是本书力图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亦为有别于其它现存伦理思想史论著之所在。本书拟通过它们论证中国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复杂而深刻的互动与交融过程。其中的道德致用、伦理重构及伦理道德与其它社会文化关系成为其中的重难点。这是需要明确交代清楚的。